



发现海门

关于通东人(古海门人)和通东话的来源问题,《海门日报》曾发表过多篇文章,多年来讨论一直没有停止,但民间的讨论更是十分火热,争得面红耳赤那是常有的事。因为人们都渴望了解祖先,了解和继承海门的本土文化。笔者也凑凑热闹,今先谈谈通东人来自何处的問題。

众所周知,海门人按照方言划分可以分为沙地人和通东人两大类。沙地人是清乾隆年间从崇明和江南等地迁移过来的,至今仅有200多年历史。通东人生活在海门这块土地上已有1000多年,他们是最早的海门人。那么通东人是从何处移民过来的呢?目前的争论主要有三种:第一,认为通东人是从古常州迁移过来的(见2020年6月22日《海门日报·古风盎然》);第二,认为通东人“大部分是从北方江淮一带迁移来的”(见2020年6月22日《海门日报·通东话属于吴语吗》);第三,众说纷纭,渴望了解真相。

古海门最早的居民是常州人?

“古风盎然”在文章的开头就指出“……通东人是古海门最早的居民,是古常州人的后代。”笔者认为此提法值得商榷。

据史料记载最早生活在海门的人是骆宾王,他于武朝光宅元年(684)随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,徐敬业兵败被杀后,骆宾王与徐敬业之子徐緇(据说当时仅十岁)逃亡途中隐匿在白水荡(成陆之初的海门沼泽地)。清道光年间编纂的《海门县志》(见图一)证实了这种说法:“白水荡在吕四场,唐骆宾王因李敬业兵败,逃匿于此。”公元684年是唐代初期,当时海门还未完全成陆,尚是沼泽地,骆宾王应是生活在海门最早的人。骆宾王是婺州义乌(今属浙江)人,与常州没有关系。

骆宾王之所以能生存,说明当时海门已有人类居住。如果说骆宾王只是个个体的话,那么古海门较大的移民潮一共有五次:

第一批古海门的移民是尉迟宝庆的家人及部分兵丁。海门自汉代成为白水荡以后,数百年荒无人烟,唐代以后才逐渐得到开发。唐代初期,武则天称帝(公元690年)后,实行“酷吏政治”,大肆杀害唐朝宗室,同时追杀忠于唐室的开国元勋后人。开国元勋尉迟恭的二儿子尉迟宝庆(唐著名将领,后战死疆场)的家人也在追杀之列。尉迟宝庆家人带领部分兵丁,沿黄海一路向东南方向逃窜,他们横渡夹江——布洲夹,来到了当时被称为牛角梢的无人沙地(约在今余东),经过围好作堰、蓄淡排咸,不几年这里已开发成可耕地。唐开元四年(公元716),也即武则天死后11年,这里开始“煮海为盐”,后称余庆盐场。这是最早来海门开发的先民群体。尉迟恭是今山西人,尉迟宝庆的家人从小生活在长安(今陕西西安),都是北方人,他们的家人也也都是北方人,北方话成了最初的古海门语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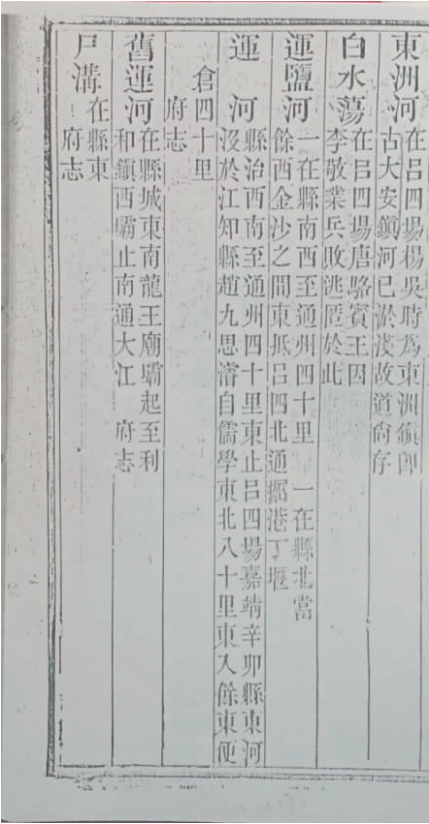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批古海门的移民是俘虏和罪犯。据明嘉靖《海门县志》载“唐大历(766—779)中李承(也称李承实)为进南(淮南)节度使判官(黜陟使)……奏请作堰以御,自楚州盐城直抵扬州海陵境……”(见图二)。李承实发动了4万多名民工在沿海一带兴起了筑堤高潮,不几年全长140多公里的沿海大堤筑成。此后东布洲得到进一步开发。唐代统治者看到盐业的利润丰厚,于是在东部沿海包括东布洲等地纷纷兴建官办盐场,其劳动力大多来自俘虏和被流放的犯人。这些俘虏大多来自北方(约在唐时与北方的突厥人经常发生战争),把战争中的大批俘虏放到四面环海的东布洲正是个好地方。由于俘虏中的突厥人大多讲蒙古语,所以通东话中也注入了蒙古话的成分。

第三批古海门的移民是陕西人。1991年在南通东郊出土了一方《姚鶚墓志》(见图三)。墓志的开头对墓主人的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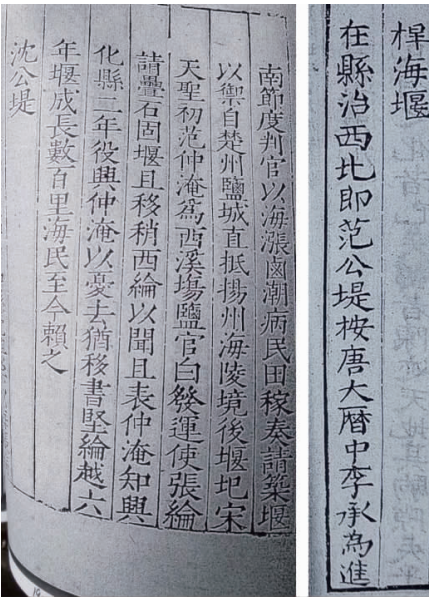
古海门移民来自何处

□李元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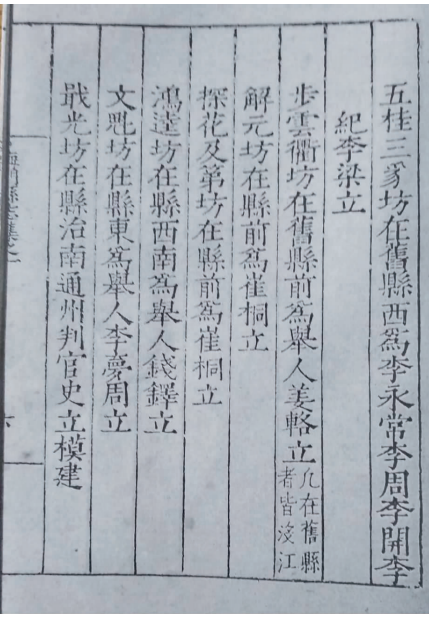
绍是:“唐故静海指挥都知兵马使兼监察御史冯翊姚公墓志。”这里的“唐”指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国,“静海指挥都知兵马使兼监察御史”是指姚鶚的官职,而“冯翊”则是指姚鶚的籍贯,古人常常把籍贯写于名字之前。那么“冯翊”是什么地方呢?“冯翊”即今陕西省大荔县。据《姚鶚墓志》记载,“曾祖讳制,东洲都镇使……”这是说姚鶚的曾祖姚存制是五代十国时期吴国(907—937)的“东洲都镇使”。也就是说曾在东洲(古海门)任职的姚存制约在唐末(890年前后)从陕西奉调过来看押罪犯,此后就定居在东洲,并且世代为官,从姚存制始到姚鶚传承了四代。姚存制“割据海陵东洲”,随之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族群。这批移民使北方方言的人口再一次增加。



图一 资料来源:清道光《海门县志》



图二 资料来源:明嘉靖《海门县志·古迹》



图四 资料来源:明嘉靖《海门县志·疆域·街坊》

第四批古海门的移民是李庭芝后人及部将。宋代末年,驻守扬州的抗元名将李庭芝(1219—1276)忠君保宋,屡败元军。咸淳十年(1274),元军又南下大举进攻,扬州危急,李庭芝誓不投降,最后战死疆场。李庭芝8岁的二儿子李辰孙在其父部将们的掩护下逃到海门,这一批人及其子孙隐居于吕四一带近一个世纪。直至明代李氏后人公开身份,并参加科举考试。李氏一门在明代曾出了五个举人,被称为“五桂之家”,明嘉靖《海门县志》中记载的“五桂三豸坊”就是为李氏五举人所立(见图四)。李庭芝是汴梁(今河南开封)人,又长期在两淮任职,他的部将也都是江淮人,部将们与李辰孙移民海门,又给通东方言注入了江淮方言的血脉。

第五批古海门的移民是“江南诸府”之民。元朝末年,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政权后,爆发了各路农民起义军间的战争,最后只剩下了两支较强的队伍,一支是朱元璋的“红巾军”,另一支是张士诚的义军。张士诚占据了沿海一带的富裕地区,并得到江南富户和盐商的支持,在平江(今苏州)自立为吴王。因其经济实力雄厚,军饷充足,武器不断更新,因此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战争打得十分艰苦。朱元璋打败了张士诚取得政权后,对跟随张士诚的旧部和江南富户十分憎恨,同时为防止这一地区的居民对明政权构成威胁,于洪武年间(1368—1397)将张士诚的旧部及“江南诸府(即苏、松、常、杭、嘉、湖诸府)”大量人口驱赶到苏北一带从事盐垦(包括海门各盐场)。其中既有普通百姓,也有“王府绅民”。江南移民的迁入,使通东方言又加入了吴方言的血脉。

由于通东地区的移民是分批而来并聚居的,所以通东话有“十里不同音”之说,通东许多地区间至今还保留着许多乡音乡俗,如四甲方言、金沙方言、吕四方言等互相都有区别。

五代十国时东洲属谁管辖?

为了说明古常州人迁徙海门,2020年7月21日《海门日报》又发表“古风盎然”的续篇《再论通东话属吴语》(以下简称“续篇”)。“续篇”中说“五代时,其地(东布洲)曾属浙西晋陵郡(今常州),通东人的祖先迁移到此地……形成了古海门人和古海门方言”。这段话中提到了两个需要探讨的问题:一是五代时有没有“浙西晋陵郡”这个行政区域?二是五代时常州有没有移民迁入东洲?

关于“浙西晋陵郡”,全称为“浙江西道晋陵郡”。唐代的的地方政权实行州、县制,“道”是监察区名称,不是行政区域名,不行使行政权力,只是到了唐中后期藩镇割据时代,才形成了实际的行政区域,但也不称“郡”,称为“方镇”或“藩镇”。“浙西晋陵郡”是唐天宝元年(742)由常州改称晋陵郡的,唐乾元元年(758),又将晋陵郡改称常州,“晋陵郡”的存在时间仅为16年。五代十国(907—960)时期早已不存在“晋陵郡”。那时的东洲属于五代十国中吴国(后称南唐)的常州(是“常州”而不是“晋陵郡”)管理。

五代十国时常州有没有移民人迁东洲?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在前面讲清楚了,在上述的五次移民潮中仅在“江南诸府”移民中有部分常州人。况且此次移民潮是发生在元末明初(1368年前后),与“续篇”所说的“五代时(907—960)”相距甚远。

另外,五代十国常州有没有移民人迁东洲,需要看一下当时的东洲需不需要移民迁入?那时,东洲已是一个十分繁荣的地方,被称为“东洲都镇”。“镇”在五代十国时期是“军事要塞”的代名词。它是吴国的军事重镇、水军基地。根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的发生在东洲的几场战争推算,东洲水军基地的水军起码有四五万人。吴国之所以把东洲作为水军基地,除了东洲的地理位置适宜外,东洲还有发达的渔业、盐业、商贸业,以及后来随着水军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船舶修造业等各业。“东洲都镇”的总计人口约在10万左右,已经达到了“壮县”的水平(当时如阜县的人口不足1万)。尽管当时东洲曾属过常州的短暂管理,但已是人口众多的“东洲都镇”,根本不需要常州再向东洲移民,历史上也未看到常州向东洲移民的记载。

故事里的卞之琳(连载)

第三辑 人文品格(十二)

□丁士凤

(上接12月1日A7版)

18.卞国福福气真好

1964年春天,卞之琳参加“四清”工作,从北京来到安徽省寿县九龙公社蹲点。消息很快传开。

当地有个名叫卞国福的青年,大学毕业不久,作为要求锻炼的积极分子参加九龙大队“四清”工作。在上中学时,他读过卞之琳的诗和翻译的莎士比亚剧本,加上又同姓“卞”,感到特别亲切。于是,卞国福兴致勃勃地赶往公社,去见见这位文学大师。

卞之琳热情接待。卞国福见这间住房很简陋,里面只有一张简易木床、一张老旧木桌、两条板凳与一盏煤油灯。又见卞之琳非常平易近人,卞国福就说:“我在大学里学的是音乐理论专业,非常热爱诗歌创作,特来向您请教。”卞之琳听了,一边高兴地地点头,一边和蔼可亲地说:“音乐和诗歌是姐妹关系,学音乐,爱诗歌,这样很好。”并要卞国福将写作的诗歌拿来看看。卞国福非常感动,又喜出望外。第二天,他就将抄在日记本上的几十首诗歌习作交给了卞之琳,请求指导。

卞之琳白天工作很忙,到了晚上还有会议,他就利用深夜的时间,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床边桌上的煤油灯下,一手扶着红色圆珠笔,一手按住那写满诗作的日记本,逐首逐页先细细地看,然后用笔圈圈点点,不时写上或多或少的批语……

卞国福正以兴奋与不安的心情等待时,很快有人带来卞之琳叫他去的口信,他高兴极了!

“你的诗作我全看了,有生活,有感情,有些诗句很好,我都做了记号。”见面后,卞之琳一边微笑着说着,一边取出那个日记本子。

当下,卞国福迫不及待地翻开日记本,多少红圈圈映入眼帘。他见《雪夜》一诗中“夜路难、卖鱼险,/一脚深、一脚浅”“爸爸肩担的不是鱼呀!/是苦、是泪、是大山……”又如在《爸爸》诗中“担担水浇到菜地,/瓢瓢水浇进菜根,/菜叶儿得水对月亮笑,/好像以立正的姿态致敬!”等等诗句中,给每行字都画上红圈圈……对此,卞之琳还喜悦地张口出声点评:“这样的诗句,不空泛,有意思。”

这一次,卞之琳在思想与做人,在治学与写诗等方面,给卞国福作了许多指导。尤其勉励这位好学上进的青年,平时在生活中一定要多观察、多看书、多思考、多写作,要从实践中领悟什么是好诗,怎么写好诗,这些都让卞国福受到深刻的教益。

“四清”工作结束,卞之琳在返回北京前夕,特地给卞国福留下通讯处和详细地址。

此后,每当卞国福上北京参加会议,总要去看望卞之琳,继续听取教诲。有一次,卞国福上门看望时,卞之琳正在伏案撰写论文,准备赴国外参加学术交流与讲学。卞之琳立即停下手头的工作,接待卞国福,亲切谈话,认真指导。也是在这次,卞之琳有感而发,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:“青年人一般都是爱诗的,往往有这种现象,年轻时写诗,中年时写小说,老年时写评论。这为何?”卞国福一激灵,接口说:“是否青年人容易激动,想象丰富,有诗的激情;中年人生活积累多了,对人物和生活剖析较深,用小说表现会更如意;老年人则多见识广,资历深,阅历广,评论更能深中肯綮,发挥作用。”“也许是吧!”卞之琳微笑着点头应道。

到了1999年,卞国福去看望时,卞之琳病愈不久,躺在床上歇着。听到卞国福来了,就执意要家人搀扶着,在书房里接见这位来自安徽的忘年交诗友。这次,卞国福手捧一摞自己新出版的诗集,敬献给老人,并无限感激地说:“三十多年来,我在您的指导和鼓励下,得以经常发表诗作,并结集出版发行,特向大师汇报呀!”当下,卞之琳兴致盎然地先看诗集名《热土地的歌》《青春的旋律》《一树春天》《朝霞满天》《拥抱明天》《为祖国歌唱》等六本,尔后感奋地说:“这是因为生活在好时代,加上自己努力的结果啊!”

2000年12月7日,在北京举行的“卞之琳先生追思会暨学术讨论会”上,卞国福满怀激情,讲述了卞之琳先生36年来对自己的谆谆教诲,多么感人肺腑啊!卞国福福气真好!

19.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

文学翻译评论家金发荣仅比卞之琳小几岁,却至诚地尊卞之琳“终身为父”。个中缘由,说来感人。

20世纪50年代初,金发荣在北京大学深造时,开始研究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代表作《失乐园》。这是一部被誉为关爱人类命运的世界音乐史诗,研究者颇多。金发荣研究《失乐园》的论文,观点出新,受到客座教授、英国文学评论家燕卜苏的赞赏。谁知,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,金发荣为此屡屡蒙冤,长期背上“黑锅”。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纠正,年已花甲的金发荣带着病妻弱女到武汉大学复职。他一边工作,一边

利用业余时间,矢志不渝地将研究《失乐园》的论文加工完善。可这份曾为之付出自己政治生命代价、化上多少年心血写成的学术论文,何处能得以发表?

远在北京的卞之琳获悉金发荣的蒙冤与现状后异常同情,尽管对《失乐园》从不感兴趣(除了个别章节),也从没有读完过,但马上跟对方联系,然后认真审读其长篇论文,感到颇有价值,欣然展纸挥笔,给武汉师范学院《外国文学研究》编辑安康写了封信,说:“金发荣的论文中颇多创见,与一般英国论《失乐园》的批评家和学者说法不同。这篇论文是从《失乐园》本身里找出根据,阐明弥尔顿的思想。我最近看过,并对译诗提出了建议。他还要从十七世纪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继续写文章。现在先发表这篇提出充分证据、发挥自己创见的精读作品,我认为是很好的。文章也并无政治上、政策上不妥的地方。请你们编辑部审议。”金发荣的论文很快在该刊登载了。

为此,金发荣感激涕零地说:“作这样的介绍,卞先生是第一人!在发表文章千难万难的岁月里,他为我争取发表的机会,为学术作出了贡献。”

对于文学翻译,金发荣早就喜爱。当年卞之琳翻译出版英国著名小说《紫罗兰姑娘》,他就找来读了,并下功夫对照原作,反复体味译文,还模仿着竟然写起自传性小说来。在西南联大,他旁听过卞之琳的翻译课。金发荣为卞之琳突破那些老翻译家提出的译文三要素“信、达、雅”,主张只突出“信”,做到“信”了,“达、雅”也在其中了,对这种胆识和创新精神而非常佩服。那时,他因为只是听,不实践,卞之琳所讲的有关“音组”或称“音顿”方面的译诗细节,过后就忘了。

现在,金发荣为续写论文引用而需要翻译好《失乐园》中的诗,自己先译了一些方块诗,与简单的“豆腐干”样诗,寄给卞之琳请教。卞之琳热情洋溢地写上千字回复,先阐述译诗的原则与方法,着重指出:译诗要注意细节的细节,留心平仄的搭配,要念来顺口,易读易懂。尤其对“音组”或称“音顿”怎样作为诗行的单位,字数怎样配组为基本骨干,以及诗行末尾配置虚字(语助词)等都作了提示,并介绍自己在这几方面已发表的知识性文章让对方阅读。同时,对金发荣寄来的译诗作了修改,写上不少批注,并要求他改译后再寄来看……

后来,知道金发荣要译整部《失乐园》诗,卞之琳在信中称其“雄心可嘉”!并提出:“最好先试试用怎样译法,要不然徒劳无益,我们再经不起时间与精力的浪费了。”在往后的信中,卞之琳说:“等你明年译出了全诗,再给我看。”这让金发荣备受鼓舞。

为帮助金发荣译好全部《失乐园》,卞之琳特意将自己的好友、研究弥尔顿资深专家、北京大学教授殷宝书介绍给金发荣,作具体指导。待到他将《失乐园》译完定型,卞之琳又向湖南人民出版社推荐,并请那里的资深责编杨德豫给《失乐园》译稿加工后,顺利出版面世。

“卞师是我发表第一篇文章、出版第一本译作的介绍人和台柱子啊!”金发荣欣喜若狂地说,并将对卞之琳的敬爱珍藏在心中。

此后,卞之琳经常给金发荣写信,鼓励他不断进步与提高。如在一封信中说到,金发荣原在北京大学的同学金隍,因翻译理论有建树,现在被派往美国和英国访问,进行学术研究。金发荣见信后感慨地说:“这正表明卞师深切地关爱着我,要我发奋图强。只要力所能及,他也会送我出国。”又如,卞之琳在另一封信中告诉金发荣:“有一位美国友人(诗人、教授),热心把我二三十首自译诗拿回去给一家出版社出版。一年后寄来样稿,看了使我尤为失望,竟改了许多,差不多都让我不满意(英文虽不是我的母语,我自信多少还知道好歹,人家又不懂中文),只好有的自己另外改,有的改回原样,附信说他们如不同意,我宁愿不出版。”金发荣看到这里,被卞师的自信心、极有自知之明的精神感染,并为他从事文字工作字斟句酌了一辈子、中外文字语言功力非凡而赞叹!在平时,金发荣深感卞师是位拼命工作忘掉一切的名士,还说自己立业先于成家,在气质上也受他的影响。

卞之琳因病逝世,金发荣不顾年迈,去八宝山送别,心头思念、哀悼之情特别强烈,当下即以《一代诗星遽陨落》为题的悼诗写在花圈上,之后又著题为《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》的万言长文深怀悼念! (未完待续)



卞之琳研究

图三 左图为存于南通博物苑的《姚鶚墓志》碑,右图为《南通市志》对碑文的翻译。